

听了工人的声音，大学生感动得流了泪

我院同学和工人同志座談

7月10日，我們礦61.3班同学乘車来到了东郊北京機織印染厂，和工人同志們举行了座談和联欢。

在这里，我們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一点半鐘，在厂方和团委会同志們的陪同下，开始參觀該厂的生产車間。機織印染厂是建于51年，旧址原是八四联軍的靶場，过去附近农民常因流彈而損命，今天这里是拥有1300余人的工厂。机器都是国产品，生产率从51年的100%上到56年的1077.2%。这是一幅新旧社会尖锐对比的鮮明写照。

生動的一課

三点半鐘，工人同志們下班了，我們分成了两个組和工人同志們座談，他們有女工、青工和老年工人。

老工人刘重义說：“我十三岁在东北工作，受日帝压迫，吃混面，喝冷水，挨皮鞭，国民党来了，生活更苦，我被迫当了反动軍队。解放后我有了工作有了爱人和孩子，我們倆人工作每月工資一百多，每天吃大米白面；现在买了手表、自行車。党和毛主席給了我們幸福。右派分子用党的某些缺点夸大歪曲，說什么人民生活降低了，不！是地主资本家們降低了。他們过去剝削別人，今天剝削不到了。右派分子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他最后說：“沒有党的領導，就是叫我們回到受压迫过牛馬生活的老路上去，我們坚决支持学生的反右派斗争，学生的胜利就是我們的胜利。”

女工段慧貞激动地說：“大学生生活这么好，党培养你們受高等教育，我这样想，你們怎么糊涂了，吃了糊涂湯了。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你們不想想是誰培养了你們，工人、农民辛苦地劳动是为了什么？国家和人民还盼望着你們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象葛佩琦这样的人还是个講師呢！我說早就該整他了。”沉默了一会，她接着說“九岁那年我为了养活全家去張家口連火車票也买不起，大家湊合些錢帶了些小米回家給日本鬼一刺刀……口袋破了，小米沒有了，全家挨着餓。”她沉默和停頓了長久……大家激动得一言不发……她最后更正說“我剛才所指的是右派分子。”其他的工人同志也紛紛发言，在大家的发言中都是一致談道：过去我們象牛馬，今天作了主人，有了优越的劳动条件；从前沒有文化，今天能看报了……。右派分子說“肃反搞糟了”，是的，反革命分子被杀了关了，对敌人說是糟了。

統購統銷糟了，是的，‘私商不能剝削’，在旧社会生活的人都不会忘記，那时我們排队几天几夜也买不到一斤混面，而今天統購統銷正是保證了我們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老染工郝紀和說：“过去我是个私販，这头买了米，掺上水和糠，到那头去賺錢糊口，难道还讓我們回到这条路上去嗎？今年我家鄉鬧了災荒，国家采取了紧急措施，一个人也沒有餓死，这不全靠統購統銷嗎？”

李書勤說：滿洲国时期我在朝鮮連自己是个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鬼子不讓父母告訴我。

女工馬玉勤的弟弟九岁那年当学徒挨打受餓，蹂躪成病，今天她两个弟弟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工人們情緒激昂地說：“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不打退右派分子决不收兵！”

两个多小时的座談，我們彼此融洽了热情和感动，体现在簡短而精彩的联欢中，从来沒有唱过歌子的团委会書記給我們唱了美丽而动人的歌曲：“幸福的生活”。当夜幕来临的时候，我們不得不怀着依恋的心情和工人同志們握手告別。雨越来越大了，我們受到感动的心也随着燃燒，虽然雨点不住地淋在我們的身上、臉下、头上，渾身都淋透了，但是我們还是在热情的歌唱，因为这生动有意义的一天給我們帶來了支持和力量。

我們的態度

11日上午，我們全班进行了漫談，大家都

用沉痛的心情檢查了过去的錯誤，並且紛紛提出保證。

蔡森同学流着淚說：“当我听到一个九岁的孩子，正当念書的年齡去当学徒受尽折磨，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家庭，我的母亲因为長期繁重的劳动患了严重的心臟病。要是在过去，自己怎能上大学呢。再想到自己在這次斗争中消极的行为感到十分慚愧，我保證今后坚决站稳立場，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孙望超同学說：“我們知識分子常常‘自以为是’，看問題是好象很客观，称之为沙里淘金，其实立場並不穩，工人同志自己說是老粗，他們不会咬文嚼字，可說出来全是亲身感受，非常动人，比我們乾巴巴学理論强多了，这次活动對我們是一次生动的階級教育！”

朱肖多說：“我本来对这次学习很不重視，而工人們八小时劳动后，虽然很累，每天还看一二小时的報紙，他們对右派言論非常气愤，自己为什么沒有这种感觉呢！对右派分子抱着温情主义，認為別人都过火了。我出身在封建的家庭，过去那能上大学，今天我是个調干生，每月助学金二十九元，有时自己还不知足，我沒有想想今天的生活是那兒来的，我觉得自己忘了本。她說着就伤心地哭了……。今后我只有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来报答工人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在这次斗争中坚决站稳立場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同學們的发言，很难用我这支筆深刻地刻划出来，这余声留待我們全國的青年去深思，

徹底打垮“亂彈社”

机60.9 王起禎

一、一個迷語

考查时期的某一个晚上，亂彈社的基本成員們（沈浪除外）和唐正千等人在一个房間里开会。团支書剛一進門他們就停止了話語，团支書問他們开的什么会，他們說：“絕對保密。”团支書想參加他們的組織，他們不要。並聲稱：“發展組織成員，个别接触，集体审查。”到底他們开的什么会呢？我也很奇怪。据这些成員們說：“他們的組織是为了自修彈性力学”（？）我有些不相信。

因为，我有以下四点疑問：
①正在考試期間，为什么想起成立学习彈性力学的組織呢？

②为什么向团組織絕對的保密？为啥不吸收团支書呢？发展成員为何要个别接触，集体审查？

③当人民日报社論发表以后，为何有的成員說：“幸好我們沒有說出去，否則又得挨棒子。”請問該社成員們，你們想說的究竟是什么？

④从成員們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两个阶段中所表現的两种显然不同的态度，也值得怀疑。

此态度各成員有輕有重，我仅以唐正千为例來說明：唐曾几次任我“鳴放”工作組主席，表現得非常积极；奇怪的是在反右派的时候却迟到早退，不請假擅自不参加會議。工作組的其他同志們象請老太爷似的也請不来。故我認为他积极是想“翻身”吧！他不參加會議是想拉我們反击右派的后腿。

二、“亂彈社”的宗旨和目的

“亂彈社”是在我們停課反右派期間，他們訪問了北大之后成立的。当我問到該社的目的时，有的社員大发雷霆，有的内心极为不滿。說：“我們沒什么目的，只是开玩笑”，我看他們有愛有憎，他們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对党抱有不滿和敌視情緒。因此是有目的的。事实胜于雄辯。請看下列事实：

(一)人民日报社論发表后，該社社員們

去檢查，去體驗工人同志的生活和感情。我們班的同学一致表示：要坚定地站稳无产階級的立場，在这次运动中，提高自己，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回家。

(礦61.3班 潘曉田 徐紹棠整理)

工人同志給我院

訪問同學的一封信

敬愛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同學們：

今天我們能够和你們在一起座談和联欢，感到十分荣幸，特別是給我們帶來了斗争的本錢，丰富了我們的知識，理論与实际的結合，才是我們更有力的武器。我們知道这是一个工人与知識分子联合起来的向右派斗争的一个誓師大会。通过座談會給我們在反击右派中很大的帮助，真使我們万分感激，特向你們致以崇高、热情的敬礼。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們要站稳立場，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線，辨別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对右派分子的謬論作坚决的无情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决不容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对党和人民的污蔑。我們完全理解你們反右派的心情，你們推迟或牺牲了暑假，参加反右派的斗争是值得我們学习的，你們这种行动也表现了知識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們要携起手来共同在党的领导下站在反右派斗争的最前列！最后祝你們在反右派斗争中获得偉大的胜利。

此致

敬礼

共青團機織印染廠

第三、五、六、九、十一支部

1957年7月10日

非常不滿，異口同声的說：“人民日报在打棒子”，“儲安平是对的。”而且毕震中（他不承認自己是亂彈社社員，但是該社写的稿件是他写的；为社出主意、对外辯护也最卖力）也認為“党天下”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說儲安平是善意的，整风应该只提缺点，不提成績，同时又說：“人民日报只报导工农反右派的言論，不报导支持右派的言論。”我們看一看，人民日报社論，說了些什么呢？我看只不过指出：

1. 有人借党整风的机会，夸大缺点，抹杀成績，借此迷惑群众，拆党的台；

2. 工人、农民和正直的爱国人士出来說話的时候，右派分子就猖狂的吼叫起来，好象踢了他們祖宗的牌位一样。

既然人民日报只不过是為我們爭得了說話的权利，而該社的社員們為何異口同声的說：“人民日报社論是打棒子”呢？难道你們不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为右派鳴不平嗎？你們沒有愛和憎嗎？你們沒有不滿情緒嗎？

(二)該社社員們一致認為“我国的选举制度不民主”（?!）据說是因为候选人是党指定的，不选不行（？）选民不知道代表是誰（？）故不民主。故然选举中是有缺点的，但他从根本上得出結論是制度不民主。他們学了七、八年的馬列主义，这些东西应该是懂的，党是真正代表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他們說不民主只是因为他們对党和政府有不滿与为右派不平的情緒；不滿是对党不滿，不平是为右派不平。他們的意志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意志，他們能够代表誰的意志呢？这不是很明显的立場問題嗎？

(三)該社社員訪問北大回来后，說：譚天榮是当代才子，对譚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們要問，他們佩服的是什么呢？譚天榮是共青团的叛徒，他仇視社会主义，攻击、謾罵党中央，否定无产階級專政，說什么“論和再論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是絕對的愚蠢和无知”“人民日报社論是沒落階級的垂死掙扎。”譚天榮是在

(下轉第二版)

趙錫霖 5月25日在教授座談會上發言的實質

王正生

趙錫霖在5月25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不折不扣是代表右派對鋼院黨的領導又一次的猖狂進攻。

我們知道，在趙錫霖發言之前，劉景芳和劉寶智等右派分子已經分別在5月17日和5月21日的教授座談會上，對我院黨的領導進行了猖狂的進攻了。他們用最惡毒的語言來污蔑黨的組織和醜化黨的領導。他們把黨的領導說成是封建家庭加官僚統治的主宗官集團。他們把黨委領導下的鋼院說得烏煙瘴氣、漆黑一團；企圖在群眾面前打擊黨的威信和搞垮黨的組織，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自稱為“當仁不讓”的趙錫霖，身為鋼院民盟的主要負責人，這時候本應挺身而出，辨明是非來糾正歪風才是正理。但是，事實證明，趙錫霖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不但未予反擊，反而認為以前的進攻還很不够，很差；並且以“未中要害”表示遺憾；認為他們的進攻是“一般的多，具體的少，行政多，教學與科研少。”於是，趙錫霖親自出馬，針對所謂要害，來一個猛攻。趙錫霖把這種進攻的姿態說成是從善意出發，這是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

趙錫霖進攻的目標是很明確的，就是鋼院黨的領導。但是他舉的旗幟卻是反宗派主義。在盟會中有人問他“要害”是指什麼而言。他說是指教學與科研。趙錫霖自己知道很清楚，教學和科研是鋼院的中心工作。攻擊黨的領導不針對教學與科學研究，就不能击中要害。所以趙錫霖就在反宗派主義的掩護下來反對黨的領導，從教學和科研方面向黨進攻。

趙錫霖的進攻不僅目標明確而且也是有策略的。在他發言的第一部份“先提幾個問題”中，充分地表明了他進攻的目標策略。

趙錫霖提的第一個問題說：“鋼院領導已知三害嚴重，為何仍似找不出那害為主的樣子？為何不引導大家向要害開刀？黨內為何不先鳴放？”初一看，好像是建議黨內先放，但是看到後面，“我不懂為何直到現在還有主宗氣味？現在到了應該推心置腹的時候，不能再說假話，應該把假面具全部扔掉；有啥不能擺在明處談談？”這時才知道原來是迎頭痛棍，那里是什麼建議。等到全部發言看完之後，才知道那並不是什麼棍棒而是向要害進攻的第一炮。趙錫霖在第一個問題中以叫街罵陣的方式暗示出黨的領導過去是帶假面具說假話；也就是說過去黨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培養人才，為人民服務以及黨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都是騙人的假話。趙錫霖為了證明他這話，發言中硬說“鋼院是三害辦事處，升官發財，欺上瞞下，吹牛拍馬，耍把戲，弄手段，投機取巧，販賣學術的地方。”他把黨的領導說成以拍捧過活，如過大烟癮，一日無此，四肢不舒。我們知道

只有舊日的封建官僚統治者，才是以拍捧過活，趙錫霖就是這樣地把黨的組織說成一個自私自利的集團，把黨的領導比作官僚封建統治者。他就是這樣來否定黨的性質，否定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最忠實、最勇敢、最覺悟與最守紀律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否定了黨是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一個大公無私的政黨。趙錫霖對黨的領導如此進行污蔑和攻擊，當眾質問黨委“為何仍似找不出那害為主的樣子？為何不引導大家向要害開刀？黨內為何不先放？”想要黨委承認自己是一個宗派集團，來一個內外夾攻，把黨搞垮。這就是趙錫霖向要害進攻的第一炮。

但是，否定黨的性質，污蔑黨的組織，必然遭到堅決的反擊，於是他又開了第二炮。“黨內在思想認識上，究有多大障礙？為何還能容忍某些黨員對鳴放有抵抗情緒，有的黨員為何愁眉苦臉？為何有的黨員那麼急于說服解釋？”趙錫霖不容忍黨員對右派分子的進攻有抵抗情緒，不准黨員愁眉苦臉，也不准黨員說服解釋。趙錫霖為何對右派這樣厚愛而對黨又這樣仇視呢？趙錫霖提出這樣的無理的要求，是真的幫助黨整風呢？還是領着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呢？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趙錫霖的第三炮是：“黨領導對解決眾所周知的黨內小宗派，小集團（從教學，行政，人事一直到壓制學生的宗派把頭）和少數喪失黨員資格的，決心到什麼程度。”他所說的眾所周知的黨內小宗派，小集團（從教學，行政，人事一直到壓制學生的宗派把頭）自然是指黨的組織系統——各部門的黨支部分支部。他要求黨委在這方面表示決心，自然是要要求黨委取消這些組織，並且把趙錫霖認為少數喪失黨員資格的，開除黨籍，送法院辦理。我們不禁要問趙錫霖這是你誠心誠意幫助黨整風呢？還是在組織上瓦解黨的組織，給右派分子進攻打氣呢？

他對黨進攻的炮火，節節進逼，最後對黨委提出了“黨內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的，為什麼還不作那怕是初步的檢討？為何還不和群眾見面？”很顯然，他的意思是要求黨委當眾檢討宗派主義的錯誤，來搞垮黨的領導在群眾中的威信和搞垮黨的組織，而趙錫霖說：他是誠心誠意幫助黨整風的。誰能相信他的話呢？

趙錫霖除了對黨進行主力攻擊之外，對積極分子也進行孤立和打擊。說什麼“為何積極分子現在消沉了？對鳴放為何厭煩？為什麼歌功頌德，獲益非淺的，還在幫腔作勢？”

另一方面，對部分黨團員又進行嘲弄和拉

攏。說什麼“為什麼平時教訓我們的，具有高度馬列主義水平的，今天還跟不上落後群眾？”他的意思是說，過去你們走在前面，今天落在後邊，趕快扭轉方向，趕上來跟他一塊走吧！

最後趙錫霖又挑撥老教師與黨的關係，企圖使老教師在右派分子的進攻中，保持中立。說什麼，黨“對老教師現在真的信任了麼，信任到什麼程度，還是個問號？”“老教師這幾年雖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加工’和‘冰冷處理’。但是我敢說每人對祖國的崇高的熱愛，心中還是熱血沸騰！”

我們大家看看，趙錫霖這一套進攻的策略是多麼全面和系統，是多麼陰險和狠毒！趙說這是他綜合鋼院大字報得來的，試問鋼院那一張大字報有這樣的內容呢？趙錫霖，你的“雅意”我們完全知道，不必狡賴。目前問題是要你老老實實交待這些策略是受何人指示。

你在發言中，一方面醜化黨的領導，而另一方面卻把自己說得無比高超。說什麼“老教師雖有滿肚子委曲，不斷受打擊，有情緒，並不計較，仍努力工作，改正錯誤。”你的企圖是什麼呢？難道不是想把黨委搞垮，自己取而代之麼？

你為了配合進攻，又到處點火，說什麼：“鋼院教授想走的不少”，“好的不來……玩不轉的不要，比我們高的本領大的不請”；

“鋼院對外關係不好……有些高中學生也不想來”；“領導號召，佈置以後，工作推不動。”你說得鋼院的危機重重，怪不得同學們要大聲疾呼，拯救鋼院危機。你到處點火，惟恐天下不亂的企圖是什麼？難道說這是誠心誠意助黨整風嗎？

你發言當時，把右派份子的進攻作了樂觀估計，認為自己的進攻，一定會击中要害。於是，在你發言末了，提出最後幾點建議，來處理善後：成立校委會，宣佈肅反錯誤，取消級別，重新評薪，成立教學人員聘任委員會。你就這樣地把黨委一脚踢開，企圖成立以趙錫霖為首的校委會，來實現你所嚮往的歐洲學術自由。趙錫霖，難道從這里你還看不清楚自己的思想實質麼？

今天反右派言論的鬥爭是在思想戰線上二條路線的鬥爭。你應該看的很明白，右派的進攻，在全國人民的圍剿下，已經徹底破產；全國人民堅決表示，永遠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容許右派分子篡奪領導，把我們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趙錫霖，你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早已放在大家面前。目前只有老老實實交待自己的各種陰謀活動，徹底批判自己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你執迷不悟，不肯低頭認罪，你將自絕於人民。現在是你悬崖勒馬的時候了！你要好好地考慮考慮！

給趙錫霖的一封信

趙先生：在反右派鬥爭中，你在各次會議上所作的“檢討”一次不如一次，拒不交待、頑抗到底，極盡“推、拖、拉”之能事。我們對你這種鬼把戲早已識穿，因為這是右派分子的伎倆，激起了我們極大的憤慨。

為了揭穿你的真面目，我們向你提出下列問題，請速在院刊上作公開答复。

(1) 你和右派分子羅隆基、錢偉長、費孝通等有何關係？上次會上你對這個問題的交待純粹是謊言抵賴。

(2) 聽說陶大鏞來鋼院找過你，你們交談了什麼？

(3) 你們所提的“教務委員會”是何人授意的？動機何在？

(4) 你說，“在肅反、整風中都沒有击中你的要害。”究竟你的要害是些什麼？可否攤出來大家看看。

(5) 你在鋼院企圖大力發展民盟組織，這和章、羅發展民盟的計劃是否一脈相通的？是不是羅隆基的指示？

(6) 你為什麼要推翻前幾次的檢討，表現頑固、拒不交代，用意何在？

(7) 你在“科學研究”上耍把戲之目的何在？

正告你，我們一定要徹底揭穿你的陰謀，全力和你戰鬥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望你立即“悬崖勒馬，回頭是岸”。這是你唯一光明的出路，否則將自絕於人民!!!

輿60.7班 全體同學

(上接第一版)

探討學術，獨立思考的掩護下向黨進行猛烈攻擊的。這就是他們在北大所看到的譚天榮的言行。回校後，他們開會研究，要請林希翎和譚天榮到我院來演講(此事未得逞)，並且說：如果有同學要打她和他的話，我們便出頭包圍保護。”

畢震中高唱：“劉景芳先生的言論應該當作學術討論，不應該追究他的動機和目的。”周善洪也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三害的根源，”又聲稱“我這是獨立思考，學術探討”由此可見，在某些方面他們和譚天榮、林希翎起了共鳴，如果沒有立場做內因，怎麼會这么快就接受了反面的東西，北大正面的東西就接受不了？

(四) 該社社員們在反右派鬥爭中沉默不語，並有意的扯我反右派工作組的後腿，例如：畢震中是工作組的領導者之一，在研究工作中一貫的抱著棄權、反對、保留、作廢四種態度，據他自己說是為了扭“盲從”者們的方向(指積極反右派的人)這就是他的愛憎。

周善洪也是工作組的領導者之一，在反右派開始後，堅決要求退出組，據他說是主觀上不想干了，為什麼鳴放時積極，反右派就不干了呢？

三、“向亂彈社”展開說理鬥爭

班里曾幾次開會批判他們的言行。該社社員們有的做了不認真的檢查，有的進行了瘋狂的反扑。鑒於該社對全院的影響，(尤其是沈浪的“論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問題”上)並且他們還繼續頑抗，我們才召開了機二全體大會，向他們展開了說理鬥爭。

機二大會開過後，該社社員簽訂了攻守同盟，一致採取了拖延和反擊戰術，在团支部會

上和其他接觸中都用可憐的形象說：大家委屈了他們，籍以迷惑群眾。

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同學們正在和他們展開複雜的說理鬥爭。

看來他們的陣腳已亂，我們已有初步戰果，有的社員交待了一些問題。但是大將畢震中還死不交待，以不參加會議對抗組長，向組長進行了猛烈的反擊，企圖壓穩陣腳，爭取群眾，但是“做賊心虛，”不敢和我們正面說理論戰。

沈浪、周善洪現在是邊戰邊退，企圖滑過去。戰鬥正在激烈進行中。

來函照登

編輯部：

院刊101期刊載軋三盧維嫻等同志的“人民日報編輯部同志談關於目前反右派鬥爭的一些問題”一文，是必要的。為避免再有某些誤解，又起“副作用”，我申明：

(1) 院刊83期登出“機械系部分同學和人民日報編輯部座談”一文，不應認為是“座談會的紀錄”，而是由個人綜合轉述的。若傳達失實、語文錯誤，只由我一人負責。

(2) 我的報導中，並沒有“跟編輯部某些同志的交談”都可以“代表編輯部”的意思。我們訪問時，趙同志自己表示“我們談的看法，可以代表編輯部，若是個人意見時，我加以聲明。”而在我轉述的幾個問題上，他並未加以聲明過。因而，我寫道：“他們的看法，代表編輯部。”

(3) 盧維嫻等同志為消除誤解的這種明察事實、仔細負責的作法，我表示感謝。

軋59.1 陳大剛

物化系教師支部舉行擴大會議

馬如璋作初步檢查不觸及思想本質

解基培認為馬如璋是否是右派言論不能早下結論

七月十三日下午，物化系黨總支召開教師黨支部擴大會議對馬如璋和李救功兩人在治校問題上所散佈的言論進行批判。參加會議的有四十四人，有部分非黨員教師和職工應邀參加。

會上，首先由馬如璋進行思想檢查。他承認在治校問題上，他所作的“關於民主治校”一文中心意旨正如群眾對他的批評一樣是削弱了黨的領導；自己所提出的見解是有錯誤的。但怎樣是錯誤的，產生錯誤的根源在那裏，馬如璋在檢查發言中，沒有觸及思想本質。他重彈文章中的論調進行解釋說：“我當時所以提出學校應成立一個普選的院務委員會來做為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是因為一年多以來，我看到我院黨委制有很多缺點，在黨委負責下的院務委員會沒有充分發揮老教師的作用，尤其是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的作用；而院務委員會又只流於形式，缺陷很多。因此我想走群眾路線來加強院委會的作用，才提出通過普選成立院務委員會的問題。我的動機和目的都是好的。我的主觀願望也是認為黨應領導學校的。”馬如璋為了讓大家相信他所以提出民主治校的動機、目的和主觀願望是“善良的”，在他的發言中再三強調地說：“我是沒有任何野心的。”最後他以悔過的口吻說：“我現在感到還是在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治校方法”。

接着許多教師批判了馬如璋的言論。非黨教師晏偉說：“誰都知道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走群眾路線的，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在各方

面取得偉大的勝利。自從鋼院建校以來，我院黨委始終是走群眾路線的，因此才有鋼院今天的成績；但馬如璋却說普選的院務委員會比黨委會更能走群眾路線，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笑話。這不過是馬如璋要取消黨委制的一個理由。這與劉景芳醜化鋼院黨領導為主宗官集團，企圖把黨整垮的目的是毫無二致的。”

梁繼祥、李濤、楊耀東都一一地對馬如璋的檢查進行了批駁和質問。楊耀東並揭發了馬如璋在我院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同情劉景芳等右派分子散佈的言論。大家在發言中，一致認為馬如璋的“關於民主治校”一文的發表，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大家都認為馬如璋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散佈着一種資產階級民主的毒素，破壞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大家都感到馬如璋治校的主張是與右派言論相同的。

但是唯有解基培對馬如璋的檢查發言與眾有不同的見解。解基培在發言中非常含糊其詞，他說：“如何叫黨委負責制，產生的缺點究竟是在於制度本身呢，還是在於執行方面呢？必須進一步弄清楚。”為了辨明是非，他認為馬如璋的言論是否右派言論還不能早下結論。解基培的發言，使到會者多數同志極為不滿，紛紛對解基培提出駁斥；希望解基培能進一步把他的見解在下次座談會上談個透徹，不要含糊其詞。

此次座談會，因時間短促，還未談到李救功的問題，但有的教師在發言中指出李救功的言論是與馬如璋相同的。物化系教師黨支部擴大會議將繼續召開。(寸言)

抨擊鋼院黨內的右派

楊耀東

黨內為什麼會有右派

共產黨內有右派言論，共產黨內有右派分子；這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是很奇怪的。其實不然。共產黨員和群眾一樣，都生活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複雜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環境里。不能忘記，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思想領域內誰戰勝誰的問題，即資本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究竟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最後解決。同樣也不能忘記，在我們的黨內，有少數人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雖然他們參加了無產階級最先進的戰鬥部隊——共產黨，但他們由於受舊社會和剝削階級的薰陶、影響較深，思想上還未獲得根本的徹底的改造。因此，一遇到大風浪、大運動的時候，黨內就會有少數人站不穩黨的立場，背棄人民的利益。這種情況，我們在鎮反、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等偉大的政治運動中，都是看到過的。整風和反右派鬥爭，既是大運動、大風浪，那麼少數共產黨員出了問題，背棄了黨和人民的立場，這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任何事情和現象，都是有它的原因的；我們只要找到它產生的原因，我們就可以不費多大力氣地去解釋它、說明它。

黨內右派人數極少

在右派分子大舉向黨的領導權猖狂挑戰和進攻的時候，不僅一部份群眾由於對時局模糊不清，被右派分子所迷惑，而且個別的共產黨員，由於沒有站穩黨和人民的立場，也會在某些問題上附和右派分子；在言論上替右派分子搖旗吶喊；在思想上以至行動上都變成了資產階級右派。人民日報七月一日的社論說得很好：“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里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社論的這几句话，極其明白地向我們每一個黨員、團員和愛國的青年敲起了警鐘：儘管資產階級右派是一小撮人，他們人數極少，但我們在鬥爭中也要充分提高警惕，站穩黨和人民的立場，不然就會被一小撮右派分子所迷惑，甚至會被拉到他們的臭泥坑里去！

北大已被開除黨籍的學生、右派分子龍英

華，是整風中出現的黨內的右派分子。我們鋼院黨內也有極少數的人是右派。雖然他們只有右派言論，沒有行動，但他們畢竟是有言論的右派，他們在整風期間散佈了不少的系統的右派言論。鋼院黨的右派，我是指物化系副主任馬如璋（黨委委員）和化學教研組講師李救功（黨支部書記）而說的。

馬如璋和李救功的反黨言論

馬如璋和李救功在整風初期，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黨的領導，對黨在高等學校的天經地義的領導權，作了謾罵猖狂的進攻。他們兩人自命不凡地，以既精通業務，又精通馬列主義和黨的高級政策的“內行人”自居，企圖以他們自己代替鋼院黨委的領導，企圖把黨委貶低到所謂經由普選產生的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院務委員會——的可有可無的附屬品的地位。馬如璋對黨委制作了許許多多的攻擊，毫無事實根據地誇大黨委制的缺點。馬如璋認為，高等學校宗派主義的產生，其根源在於黨委制，即在於黨的領導。按他的“創議”，高等學校只要採取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的形式來治校，“就可以防止宗派主義”了。馬如璋說：“黨委制實質上是黨員治校，因而老教師就沒有發揮了作用，形成了三害危亂。”馬如璋的這種濫調，和儲安平的宗派主義的根源在於共產黨的領導的謬論，實質上是一樣的；所不同者，只是儲安平是就全國範圍說的，而馬如璋是僅就鋼院或高等學校這個範圍說的。

馬如璋的反黨有其個人野心

馬如璋在提出他的院務委員會“治校方案”時，是有其個人野心的。他說：“黨員同志不要顧慮選不上，只要辦校內行，就能選上的。”其實，馬如璋這句話的心里的意思是：自己是黨員系副主任，是內行，因此，自己是准會選上的；至於黨委的其他成員和其他的黨員，由於他們不是內行，他們自己就會顧慮自己是否選得上。馬如璋說話的口吻，顯然是想“安慰安慰”其他的黨委委員和黨員，打消他們的“顧慮”，使他們也贊成他的“治校方案。”按照馬如璋“內行人”的標準，大概他來做院長是再適合不過的了！因此，我認為馬如璋反對黨委治校，企圖使自己獨攬鋼院的大權的野心，是較明顯的。馬如璋在治校問題上的露骨的右派思想，是黨內少數野心分子把自己高高地置於黨之上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反映。對馬如璋的這些反黨思想，必須給予猛烈的反擊。在反右派的鬥爭中，無論是群眾中的右派言論或極少數黨員的右派言論，都必須給

予反擊，而且是要一視同仁地、以同樣堅決的程度反擊。黨決不是“宗派組織”，黨員的右派言論，必須更堅決的反擊，否則就不能保證黨的高度的純潔性和戰鬥性。

馬如璋對行政人員的攻擊

馬如璋為了達到他反對“黨委治校”的目的，對參加革命多年的、現在領導高等學校的老同志，便大加“描繪”了一番，對他們作了極大的冷嘲熱諷：說什麼老革命幹部“認為自己參加革命多年，掌握了原則，不需要懂得‘繁瑣的’業務，就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遠距離操縱的遙遙領導。”還不止此，馬如璋對他們還進行人身攻擊：說什麼“行政方面的領導同志在學校中受到過份的尊重，而變為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這里，馬如璋不僅對學校的行政領導人作了人身攻擊，把他們醜化成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而且也侮辱了我院的行政工作人員，把他們說成是“奉迎者”和“拍馬者”。既然，鋼院的院首長是“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那麼這些首長當然應該下台，“恭恭敬敬地”把院首長的職位讓給馬如璋！馬如璋在文章中既然這樣以專家自居，囂張到侮辱和攻擊全體行政人員，這是誰看了他的文章後，都會感到憤慨的！我不禁要問馬如璋：難道只有教學人員，只有你馬如璋這樣的“專家”才應該受到尊敬，別人就都應該受到卑視嗎？

馬如璋對黨和民主的看法極其混亂

馬如璋雖身為黨委委員，但對黨的看法極其混亂，歪曲黨的性質。在他的眼中，實行黨委制以後的黨員，是很少受到群眾的監督，嚴重地脫離群眾，甚至不是人民的公仆。他說：“假若我們採用了這種形式（指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這種形式來治校——引者），共產黨員將受到更廣泛更經常的群眾監督，這將使他們孜孜不倦地提高覺悟水平和業務水平，以使自己選中為群眾的公仆。”難道，不被選入“院務委員會”的黨員，就不是人民的公仆了嗎？

馬如璋還說：“只憑幾條干巴巴的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學校的。”難道我們黨過去七八年都是“只憑幾條干巴巴的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在辦學校嗎？新中國高等教育的方針、政策，不是黨制定的嗎？新中國高等教育的方針、政策，難道不是已經由鋼院的黨委在我院正確的，適合具體情況的貫徹執行了嗎？黨的方針、政策，需要黨的基層組織來貫徹。要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就需要黨委在群眾中進行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這些方針、政策變成群眾自己的思想和行動。試問：這樣複雜艱巨的工作，靠院務委員會能完成嗎？當然是不行的。既要共產黨領導中國，就必須堅持共產黨也領導高等學校。否則，承認一百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虛假的、有名無實的。

馬如璋對民主的了解也是虛幻的，強調了無集中的民主，把民主和集中人為地隔離開來。他說：“黨的政策的執行不能強憑最後決定權，而應取得群眾的真正贊同。”我們知道，絕大部份群眾對黨的政策都是真正贊同、衷心擁護的，這不僅僅因為黨的政策反映和代表了我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且黨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首先是依靠對廣大群眾經驗的研究，同時也重視同黨外人士的協商的。難道這樣制定出來的黨的政策，還能說不民主，還能說是以最後決定來壓群眾，硬要群眾去執行嗎？難道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群眾不應該贊同、執行嗎？我們知道，黨的不少政策，是有一定的時效性的，必須及時地制定出來，否則，就事過境遷，變得沒有用處了。因此，在我們國家的社會生活中，絕不能把民主和集中分隔開來、對立起來，他們二者是統一的。我們黨在制定全國的根本大法——憲法，以及其他一些全國性的長遠的方針、政策的時候，都是征求了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並經過全國絕大多數人民討論後，才制定出來的。況且，黨的方針、政策，在人民群眾中的貫徹執行，都是配合着說服、解釋的。這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因此，馬如璋的“黨的政策的執行不能強憑最後決定權，而應取得群眾的真正贊同”的論調，實質上要取消黨的後最後決定權，取消黨的領導。馬如璋主張由全院普選產生院的最高決策機構——院務委員會，李救功主張由民選（！）產生，儘管他們的提法有些不同，但都企圖取消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對從黨員口中發出的這些右派言論，我們更必須毫不留情地、給予猛烈的回擊！

對馬如璋“關於民主治校”一文的意見

煉鉄教研組 晏偉、戚以新

我們讀了馬如璋“關於民主治校”一文後，有許多不同意的意見，特提出供大家討論。

1. 馬如璋同志在文章中說：“我認為黨委制是有缺點的，”而這點馬認為是黨委有些事不走群眾路線而最後作了決定，因此馬認為黨委制是不好的，請問不走群眾路線是不是黨委制本身的問題呢？顯然不是的，因為馬在後面接着說：“不走與群眾商量的群眾路線，這我相信與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黨員的宗派主義有關係的。”既然自己承認這點是由領導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所產生的，怎麼又牽連到要不要黨委制這個問題呢？經過整風後，“三害”克服了，這個缺點不就可以克服嗎？馬如璋要取消黨委制的另一個理由是黨委的成員有問題，他說：“目前黨委的委員中高級知識分子很少，真正參加教學的黨員更是寥寥可數，所以黨的決議是帶片面性的。”我們認為馬在這裡說得有些太不象話了，他對黨委一些人員看做是“奉迎”和“拍馬”的，院長也成為他所說的“變為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這樣來描寫鋼院的黨委是不真實的，如果真如馬所說的這樣，那末怎麼會有今天的鋼院呢？黨委工作有缺點應該去改進黨委的工作，而不应去消滅黨委制。

2. 馬在文章的第二段中說：“那末在今天，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通過更需要走群眾路線的形式來貫徹黨的領導呢？有沒有比黨委制更適合的形式呢？我認為有，這就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從這裡可以肯定馬是主張黨委從學校撤退以院委會來代替黨委制，請問院務委員會代替黨委制就能走群眾路線嗎？如果說院委會比黨委會更能走群眾路線還值得研究，因為黨對走群眾路線是有經驗的，且是黨的基本路線，這是眾所周知的，今天鋼院的黨委還不是不走群眾路線，而且在某些事情確是在走群眾路線只是走得不够今後“三害”消除，無疑地這種情況就可糾正，而現在已經在開始糾正，所以院委會比黨委制更會走群眾路線的看法是使人難以相信的，如果在黨委的領導下，成立院委會協助黨委和院長把工作搞好，那倒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3. 馬認為院委會應該選舉。他說：“假若說共產黨員竟然被選入院委會的很少，這將說明我們黨的水平是不高的，共產黨員不是人民

所愛戴的，這就應該引起共產黨員的注意。”意思很明顯，即是說共產黨員是有把握的，今天黨是人民所愛戴的，黨員一定會被選入，只不過不是黨委會那些負責行政的黨委而已。同時在這裡他也表現了黨員的自豪感，這裡我們要問問馬為什麼不就改進黨委的工作來加強黨委對學校的領導？而一定要以一個院委會來代替呢？假如院委會選入的黨員少，甚至極少，雖然馬說的：應引起黨員注意，那末黨的領導又怎樣來保證呢？

4. 馬在第二段最後說：“黨委會仍應該討論學校大事，把黨的決議通過黨員在會上提出討論，並在廣泛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結論。”但根據他在前面描寫黨委不能領導學校的情況來看，那末黨委怎麼有能力討論學校大事呢？這不是前後矛盾嗎？按馬的說法院委會是最高決策機構，那末當院委會不通過黨委的決議，而且這個決議也是正確的時候，黨的政策又怎樣來貫徹呢？

5. 馬如璋在文章最後說“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學校的，即使受了多年的革命鍛煉也需要積極學習業務。”這裡我們同意黨員幹部應該積極學習業務，但說“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的理論治不好學校”這一句話我們是不同意的，試問鋼院過去是不是只憑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治校呢？很顯然不是的。鋼院是1952年開始籌備的，搬遷到這裡來是在1954年初，在1952年時這裡還是一塊田野，1953年—1954年才建成教室和理化大樓，當時學生400人，教師不到100人，設備極不完善，而現在鋼院經過短短幾年的努力，已經發展成為4000學生，幾百名教師，各個實驗室設備齊全，發表了將近200篇的論文，目前鋼院已逐漸成為全國鋼鐵工業在學術上的中心。這些成績不都是黨的領導和全體職工辛勤勞動的結果嗎？是不是只憑干巴巴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就可以在短短的幾年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呢？當然我院的缺點很多，各方面还不够完善，這是由少數人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造成的。

6. 馬如璋同志是黨委委員，但他却反對黨委制，事實上是要否定黨在學校中的領導，這是違背毛主席所提出6項政治標準中最重要的一項，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澄清事實，更有力地反擊右派

——並就教於杜維新主任——

李 牧 功

我在工會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曾就“如何治校”發過一次言，院刊有過報導，“工會通訊”登過摘要，但摘要未經我事先看過，是不全面的。因此我曾想寫一篇短文說明我的意思，後來到了反右派鬥爭的階級，考慮到再討論治校，可能影響直接反擊右派，因此拖了下來。最近看到七月八日院刊杜維新的“整風和反右派鬥爭”一文提到了我，說我是“鋼院共產黨內右派實例”，我認為這種提法對一個共產黨員和對今天的反右派鬥爭來說，都是一個嚴重的、帶原則性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重新說明我發表過的關於治校問題的意見，並嚴肅地表示自己的態度。

一、我在座談會上所發表過的意見

由於上次發言我未寫過詳細的發言稿，我只能重述上次發言的要點，我將力求與上次發言的原文一致。要點如下：

1. 我提到要办好學校，涉及很多方面，如思想作風，組織制度等。三個主義主要是思想作風問題，整風運動問題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組織制度也和這有關係，好的組織制度可以保證好的思想作風得以貫徹。治校問題是一個組織制度方面的問題，因此我的發言只涉及這一方面。

2. 關於黨委領導：我說我同意會上有些同志的發言，學校必須有黨委的領導，黨委的領導和行政的領導是有區別的。黨委對於行政的領導不是直接的組織上的領導，（如一個處對一個科那樣）而是政治上的，方針政策方面的領導。黨的決議的貫徹，不是依靠行政命令，

而是靠決議的正確性，依靠黨和群眾的聯繫和黨員的說服解釋。因此還應當考慮如何改善行政方面的領導（附帶說明一下，有些右派分子故意混淆黨和行政的領導，提出一個“黨委治校”的怪名稱，其實應為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還提出所謂“黨政合一”，“黨政不分”，我們同志中也有些人不清楚黨的領導並不等於黨的決議對黨外組織是強制性的。因此有必要澄清）。

3. 我對改進行政領導的意見，我的意見主要點是由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校委會作為行政的最高領導，這裡一點是應由選舉產生，做到真正民主，真正能代表群眾意見。如果代表不稱職，可以不選或者罷免，可以由教職工不同的比例選舉。例如教授在教學中起作用較大，而人數較少，可以有較大的比例，也可以有學生代表參加。另一點是這個委員會應有相當大的權力，可以討論和決定學校的重大事情，能夠批評和監督各部門工作，並有要求調換不稱職的幹部的權力。我還說明這個意見只是一個輪廓，很多問題並不具體，如人選按何種比例產生等。

4. 我認為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我認為這樣做可以發揮群眾的積極性，集中群眾的智慧，黨委的意見可以經過它到群眾中去，校委會作了決議，委員可以帶下去向群眾宣傳，如果校委會不同意黨委意見，那就可以檢查為甚么，可以防止可能產生的主觀上的錯誤，也可以吸取群眾中的正確修改和建議；再加上委員會可以批評和監督各部門的工作，就可以減少和防止官僚主義。我相信只要委員會真正代表

群眾，而又經過充分的討論和說服，黨委的正確意見，是能通過的。
以上是上次發言的主要內容。

二、對幾個問題的看法

發言以後，經過一些討論，有如下幾點看法：

1. 這是那一種民主？杜維新說我向往着資產階級民主，那麼這究竟是那一種民主呢？不錯，我的意思是要發揚民主，現在我仍然堅決相信，我們是一定要逐步擴大民主的，只有高度民主與高度的集中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問題是那種性質的民主。首先，這是黨委領導下的民主，是黨委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從我的發言中可以看出，是要將黨委的正確意見，經過討論成為群眾的意見，黨委意見中不正確的可以經過討論得到修正。這難道是否定黨的領導嗎？其次，這樣做並不是高等學校就變成獨立小王國，就可以不要管國家的政策法令，就可以不要國家和高教部的領導了。從上面兩點看，為什麼只要是由群眾選舉，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呢？我認為在黨的領導下發揮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

2. 是否能保證黨委領導？這是爭論最多的問題，有的同志認為這樣做會導致實際上削弱黨的領導，他們認為只有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才能保證黨的領導，這個問題是值得爭論的。我們國家有很多非黨員的正校院長，在實行首長負責制的時期和實行黨委領導的首長負責制，都保證了黨的領導，這就說明雖然黨的意見要通過行政，而行政部門有非黨人士，甚至主要負責人是非黨人士，黨的領導還是能夠保證的。這是因為我們有了無產階級的国家政權，有學校的黨基層組織，還有黨員領導幹部（如黨員的校院長或副校院長）和非黨同志一起工作，一起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這就保證了黨的領導。如果過去這樣做保證了黨的領導，那麼為什麼只要在校委會里有了非黨同志，校委會有決定權，就不能保證黨的領導呢？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不同意見是可以爭論的，而且也可能這個方案還有其它很多缺點，都是可以批評的。

但是不能認為右派分子借所謂“民主辦校”向黨進攻，那麼所有發揚民主的意見都錯了，這樣都恰好中了右派混淆視聽的計。現在看來右派的進攻和對於工作或制度的認真探討，是容易區分的。右派分子總想取消黨委領導，或者口頭不說要取消，而且儘量誇大黨的缺點，加以攻擊，以證明黨是實際上不能領導的；善意的意見，即非右派的意見（不論正確或是不正確），是在肯定黨的領導，肯定過去的基本成績的基礎上，來考慮如何改進工作的。

3. 我認為我當時的錯誤是沒有認識到那時主要是右派向黨進攻，想奪取黨在學校中的領導權。因此我沒有集中力量批駁右派言論，而是在那個不恰當的時候提了一個發揚民主的意見，這是我覺悟不够高，對階級鬥爭沒有認識清楚，我只感到可能有些意見過火，也有些是惡意的，但是沒有認識是右派的猖狂進攻。因此還主要是考慮如何改進工作。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展之後，才認識了這一點。因此我歡迎同志們的批評。

三、請教杜維新主任

杜維新說：李牧功“是鋼院黨內右派的實例”，並說“他們起了第五縱隊的作用”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

我想問杜維新主任：你根據什麼說我是黨內右派？你為什麼不具體分析那些地方右，就來了一個帽子？你是馬列主義教研組主任，難道你不清楚那是左，那是右？根據前面所說，我，一個共產黨員，提了一個建議，（這不是違反組織紀律）這個建議：第一，提的時候不恰當；第二，這可能是一個錯誤建議，可能在客觀上導致削弱黨的領導，不過這還有待爭論。即使這個建議是錯的，難道這就是“黨內的右派”？就是“第五縱隊”？

我想請教杜維新主任，你這樣做是為甚么？是想有利於反右派鬥爭，還是想打亂反右派鬥爭的陣線、削弱反右派鬥爭？

作者附誌：在本文脫稿時，看見了政治教研組某些同志批判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我的意思是還可能有第二張……）我不準備說什麼，只準備請他們看看本文第一段，看看批判的是不是我的觀點，此外如有同志發現本文第一段與我在座談會上發言有重大不符，亦請提出。